
陳翠蓮女士的白恐口訪經驗

訪問：范燕秋、林玟秀、徐紹綱、陳咨仰、程琬瑜

記錄：徐紹綱

時間：2015年7月10日

地點：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陳翠蓮教授，1961年生於臺灣臺北，臺灣大學政治學博士。曾任自立晚報政治組記者、政治組主任、副總編輯，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系主任、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現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日治時期臺灣政治史、戰後臺灣政治史。已出版《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相》、《戰後臺灣人權史》（合著）、《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合著）、《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一九二〇～一九五〇》、《百年追求卷一·自治的夢想》、《重構二二八一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台灣》等。陳翠蓮教授長期關注臺灣民主運動、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時期的臺灣，曾參與立法院委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執行「國會耆宿口述訪談計畫」，「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者女性家屬口述歷史訪談計畫」等。

生平

我住台北縣樹林，爸爸是住在山仔腳（今山佳），父母都來自基層。我阿公是做炭空（thuànn-khang）。媽媽那邊是三角埔仔（今新北市樹林區三多里），跟迴龍、新莊很近，那個地方現在稱為三多里。我的內公以前在三角埔仔種田（tsing-tshân）。

我是1961年生，阮（guán）家是較低層的，厝內（tshù-lāi）不是太好過，老爸、家族裡的兄弟沒有讀甚麼書，但是阮爸爸對政治的事情很關心。很小的時候就曾聽我媽媽講，因為爸爸很關心政治，雷震所辦的《自由中國》每期都有買來看。¹因為家貧，爸爸媽媽讀書不多，媽媽小學畢業，爸爸初中沒畢業，但是對台灣的事情還是很關心。阮爸爸雖然沒甚麼讀書，但是可以讀《自由中國》，所以長大後我也很好奇，伊怎麼了解《自由中國》裡面

1 1949年11月，雷震創刊《自由中國》後，結合國民黨內的開明派和黨外的自由主義者，不斷宣揚反對黨的理念，抨擊國民黨一黨專政，並與臺灣本土的反對派結合，推動不分省籍的反對黨運動。1960年正逢縣市長與省議員選舉，促組黨運動進入高潮。3月在省議員選舉前夕，由李萬居、高玉樹、郭雨新、吳三連等人召開選舉座談會，雷震及中國青年黨的夏濤聲、民社黨的蔣勻田皆出席。地方選舉挫敗後，5月18日無黨籍人士及民、青兩黨召開檢討會，主張解散民、青兩黨，和臺灣民主人士共同組織有力的在野黨，以與國民黨抗爭。6月16日決議，責成李萬居、雷震、高玉樹為新黨發言人，並派17名委員至全省各地巡迴座談。7月25日在臺中的座談會中，宣布10月前成立中國民主黨，並進行擬定創黨宣言，1960年9月4日雷震及《自由中國》編輯傅正、劉子英、總務馬之驢各以「包庇匪諜」、「煽動叛亂」罪名被捕，《自由中國》被查封。雷震遭判處有期徒刑10年，劉子英判12年，馬之驢5年，傅正交付感化。參考網址：<http://nrch.cca.gov.tw/twpedia.php?id=5782>，臺灣大百科辭典，沈懷鈺著。

寫的那些東西。伊每期都買、每期都看，這些人去被人抓的時候伊也很驚惶（kiann-hiann），就把這些雜誌都燒掉。美麗島事件之前，他也是都買《美麗島》雜誌來看。再前面一點 1970 年代有一個叫做《台灣政論》²的雜誌，伊也會買來看。

美麗島這些人都被人抓走的時候，阮爸爸又開始燒這些雜誌。所以伊看台灣歷史的過程，跟我開始讀書到長大後、我所知道的事情跟爸爸越差越遠。我跟他常常會有衝突，尤其在我高中的時候，是台灣政治變動最大的時代。在民國六十幾年，那時候高二、高三，美麗島事件發生的時候，我回來都會批評。因為在學校聽的，看的報紙、看的電視，都是一樣的東西，都在罵這些反對份子，所以我回來之後都會批評這些人是「叛徒、居心叵測份子、他們就是要顛覆政府」，吃飯的時候就都在說這些。阮爸爸都聽得很難過，「我不要吃了、吃不下了！」有時候他就會很激動的說：「啊，壞了、壞了，我的女兒頭殼壞去了，洗腦洗到壞了！」有時他就會比較激動：「你甚麼事情都不知道！你就是不知道二二八，才會這樣說…」我媽媽就會拉他、阻止他：「你不要跟小孩講這些東西，出去會出代誌」。所以我成長的過程裡面就是你越進入教育體制，就跟自己父母對台灣歷史的了解越差越遠，很多衝突。

我爸爸家中，以前很多囡仔，所以阮爸爸也是分給別人。伊

2 黨外人士康寧祥鑒於 1974 年「大學雜誌」被停刊後，島內缺乏民主言論園地，無法傳遞人民心聲及凝聚在野力量，因而籌辦黨外言論刊物，於 1975 年 8 月創辦「台灣政論月刊」。參見：http://nrch.cca.gov.tw/view.php?keyword=%E5%8F%B0%E7%81%A3%E6%94%BF%E8%AB%96&advance_d=&s=113028&id=0005777983&proj=MOC_IMD_001，國家文化資料庫。

國中沒有讀畢業，開始去找頭路，開始的時候頭路不順利。阮媽媽這邊是小學畢業，伊佇(tī)農會作代誌。他們結婚以後因仔一直生出來，我在厝內是第二個，頂頭還有一個哥哥，下跤(ē-kha)還有四個妹妹。阮媽媽就鼓勵阮爸爸自己出來創業。所以一開始是作電子的頭路，譬如說剛開始作電話、作電器。那時候台灣經濟剛好在發展，所以伊出來做的時候，機會很好，跟一些日本人合作，替日本人做一些 O.E.M³，所以銷路都很好，有賺到錢。佇阮細漢的時候本來很窮，我細漢的時候很少相片，好像只有一、兩張相片，爸爸向朋友相機拍的，家裡住在巷仔底，沒穿衣服，我就問媽媽說爲什麼都沒穿外衣？伊就講就沒有衣服給你穿啊，哈哈，穿一個底褲而已，查某因仔穿一個底褲而已，阮妹妹也是，穿一個內衣而已。所以細漢的時候很艱苦，但是我差不多高中以後，阮爸爸做事業就成功了，伊賺不少錢，所以生活就有改善。伊那時陣(sī-tsūn)跟我媽媽兩個，我高中的時候，就是政治變化很大的時候，伊當時都去聽黨外的演講，跟人家擠、擠、擠，擠到頭前去，塞錢給黨外的候選人。

林宅血案的衝擊

其實我覺得很奇怪，我們家的過程就是：爸爸媽媽知道的歷史跟學校教的歷史差很多，你越讀越多，就跟自己的父母越來越

3 OEM 最初被稱爲原始設備製造，現在則被稱爲專業代工。是指製造商依照企業客戶需求，生產符合客戶要求的產品，之後掛上企業客戶的商標品牌，由客戶自行銷售。

遙遠。有一陣子因為我成績不錯，高中的時候老師跟教官都會叫人加入國民黨，家裡就說不行，那時候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高三下學期的時候，美麗島軍法大審剛剛結束，有一次學校就廣播，應該是訓導主任，叫學生囡仔（gín-á），透過廣播，叫全校一些學生，差不多七、八個來訓導處。把我們叫來，訓導主任就說：「這次美麗島事件，壞人都被抓起來了。就是因為有一些愛國青年在幫忙，各位我知道你們都是愛國青年，所以一人給你們一個囊仔（lok-á）⁴，A4 大小的囊仔。你們回去填一填，把資料寫一寫交回來，自然就會有為國家服務的機會。」我那時候聽了很高興，可以替國家服務，我還好奇地問：「但是我們大學還沒考，你怎麼跟我們聯絡。」「這你們放心，到時候自然就會有人跟你聯絡。」

哇！我回家就很高興，趕快跟我爸說我要做 007 了，不，那時候不叫 007，那時候說：「我要做長江一號了」。阮爸爸媽媽那時候的晚上，眉頭（bak-thâu）那樣結結（kat kat），覺得很煩惱，那個晚上都沒睡覺。第二天，我要交回紙袋子，我爸爸就說：「不行，你頭殼壞去阿，很多人會被你害死，你不能填資料。」

結果那天我就哭著去學校，一邊走一邊哭，把資料帶還給主任。因為關心政治，大學我想要讀政治學，以後要參加政治，想要救國救民。當時我的偶像是孫文，還有一個當時救國團主委叫做李鍾桂⁵，她很會說話，說話很有系統，學校曾請她來演講，她演講時，時間、重點都記得很清楚，很有條理。我想我後擺（以

4 囊仔（lok-á），台語指袋子。

5 李鍾桂，1938 年生，法國巴黎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曾任政治大學外交系教授、中國青年救國團主任。

後)要跟她同款,所以想要去讀政治學。那個時代要讀政治,我媽就很煩惱,她說:「你不要讀那個啦,你去讀那個把自己的生活顧得好的,這比較重要。去讀政治,到時候你會變政治犯」。但是我爸爸很支持,他就覺得我頭殼不清楚,我如果去了解政治的事情,應該會比較清楚。因為他支持,我後來就讀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但是在台灣大學政治系讀書的時候,老師們其實都沒有提到甚麼跟台灣比較相關的事情。大學上的都是西方的東西,像憲政思想、政治學理論這些,老師都說到外國、沒有說到台灣。

甚麼時候開始有變化?就是因為一些朋友、同學,很多都中南部來的。他們看到的世界跟我知道的差很多,農業社會很多人的生活都很艱苦。我的爸爸後來是做生意,我長大的時候家庭環境已經改善、經濟條件很不錯。我很多同學家裡很艱苦,尤其是中南部的農民。農家出身的他們根本沒有像我這麼好,可以專心讀書,都要幫厝內做事情。中南部同學對國民黨的不滿,就會說出來,也會帶我去看黨外的政見會、去聽黨外的演講。我才知道說:「喔~~原來跟我了解的代誌完全無全款(bô-kāng khuánn)」,我的轉變是這樣開始的。以前讀的書都跟台灣沒關係,我想要知道多一點的代誌。因為沒書嘛,那時學校都沒教,相關的書籍也沒有,所以我後來讀碩士班時,就自己來做台灣政治史的研究。

後來就一路一路讀,讀到政治學的博士,我是家族裡第一個讀到博士學位的。博士論文寫二二八事件,就是因為我很想要了解,到底我爸爸一直想要說、我媽媽叫他不能說的到底是甚麼款的代誌(tāi-tsi)?

一直到美麗島事件，美麗島事件時我高二，高三時又發生林義雄家血案。印象最深刻的是林義雄厝內出事情，印象很深刻。中壢事件我很模糊，是後來看我爸爸買的黨外的書《選舉萬歲》，才知道怎麼回事。所以當時資訊控制很嚴密。

那時陣在報紙看到的東西，都是追殺、嚴厲批判這些人，學校老師說的也是這樣。因為囡仔人所有知道的資訊被控制，它是自成一套系統。我回去就說：「這樣的壞人通通抓去槍斃」、「這樣的人都想要顛覆政府」、「都是匪諜」。但是人類的特別之處就是會思考，是沒有辦法完全被控制的，即使像我這樣武斷的人。像我到高三下學期，二月的時候發生林宅血案。那時陣美麗島事件發生的時候，我希望當時的壞人統統都抓起來，槍斃最好。但是，林宅血案發生的時候，我覺得很震驚！那時候看新聞報紙，報導得很大篇，一邊看、一邊全身起雞皮疙瘩，開始覺得事情很奇怪，這群人都已經被抓光了，特務就守在這些人的家門口，為什麼還會出這種事情？我開始覺得很奇怪，一旦出現了跟你的知識沒有辦法解釋的事，你就會開始懷疑。我爸爸他們開始很憂傷、很同情，我也覺得為什麼會對小孩子下手呢？

即使是在哪種嚴密控制的社會裡面，人是會思考的，一旦有小小的破綻，你就會開始懷疑，原本相信的體系就很迅速地崩解了。所以我開始有一些懷疑是因為林宅血案。林宅血案的衝擊對我影響很大。

蛻變重生，美麗島

我的政治系這一班同學很多人尾仔 (bué-á) 都是政治運動者。其中一個同學，後來變成我的先生，叫做陳順良。我先生是台中人。賴勁麟⁶ 是雲林人、李文忠⁷ 是南投人。劉一德⁸ 住嘉義，雖然是外省人，可能因為他媽媽是台灣人，他看到的是台灣人艱苦 (kan-khóo) 的生活，所以他們就變成是結做一黨。劉一德延畢、李文忠是重考生，都讀超過四年，沒有那麼快畢業。他們知道的事情很多，跟當時的黨外有接觸 (tsiap-tshiok)。當時學校裡有一個異議性社團叫「大學論壇」⁹，這個團體的學生都比較積極，對政治很關心。這些社團的朋友們比較勇敢，他們很多人對體制不滿。他們透早 (thàu-tsá) 教室剛打開，他們就去黑板上寫「抗議國民黨」這種東西，教官來就擦掉，他們就是會做這種代誌 (tāi-tsi)。有一陣子，有幾位朋友去彭孟緝家，金華街那一圍仔 (uî-á)，現在變成行政院長的官邸，他們跑去噴漆，所以那一陣他們敢去做。他們對黨外運動、對民主運動很關心。我是比較外圍的人，他們做運動，我就幫忙編輯、畫畫插圖、寫點東西，我那時候比較像觀察者。但是這些朋友會帶我去聽演講，幫黨外人士助選。去參加演講以後才覺得，恁 (in) 說的代誌甲我爸爸

6 賴勁麟，1962 年生，曾任民進黨籍立法委員、曾任勞委會副主委，現任神腦國際董事長。

7 李文忠，1958 年生，曾任民進黨籍立法委員、國大代表，現任行政院退輔會副主任委員。

8 劉一德，1960 年生，曾任民進黨籍國大代表、後任台灣團結聯盟副秘書長、現任台聯主席。

9 大學論壇社，台大異議性社團。

說得很像，才知道阮爸爸爲什麼這樣想。您也去過阮兜（tau），跟阮爸爸就很多話講，顛倒（thian-thoh）我跟我爸爸沒話講。所以我想法開始轉變，其實是跟這些中南部來的朋友，想法開始改變。我就讀大學時，連續發生這幾次政治暴力案件、暗殺，譬如說高三發生林義雄家血案，陳文成案、再來是江南案，都是在我大學的時間，我的朋友開始帶我知道一些事情，政治認識重新開始的階段。

去讀政治學系，學校老師教的東西跟台灣都沒關係。後來這些朋友才帶我去，有一次帶我去花園新城¹⁰，就是黨外的人開始跟學生接觸，林濁水¹¹、陳文茜¹²，當時都住在花園新城。劉一德、李文忠就替我們介紹，帶我們去接觸這些人。十幾個台大的學生就去那邊，聽他們談論、帶我們去看一些政治犯，像柏楊¹³、李敖¹⁴，才開始知道有這些政治案件。阮爸爸媽媽知道我跟黨外的人在一起，就很緊張，開車來花園新城遶要找人，要帶我

10 新店花園新城住宅區。

11 林濁水，1947年生，曾任民進黨籍立法委員、《新潮流雜誌》總編輯，稱號台灣理論大師。

12 陳文茜，1958年生，曾任民進黨文宣部主任、無黨籍立法委員、電視節目主持人。

13 柏楊（1920-2008），作家，1968年7月，警備總部軍事法庭根據「懲治叛亂條例」第五條「參加叛亂之組織或集會」，及第七條「以文字、圖書、演說，爲有利於叛徒之宣傳」判處知名作家郭衣洞（筆名柏楊）有期徒刑12年。該項判決的主要導火線，來自1968年1月2日登載於《中華日報》的一則「大力水手」漫畫。而柏楊入獄的真正原因，還在於他長期以來在輿論媒體發表批評政府當局的言論，引起執政者反感。參考網址：<http://nrch.cca.gov.tw/twpedia.php?id=5526>，台灣大百科。

14 李敖，1935年生，作家，爲《文星》雜誌重要作者，曾任無黨籍立法委員。

回去，但是不知道我究竟在哪裡、找不到人。就是這樣的過程，我的爸爸媽媽很矛盾，一方面希望你知影台灣的歷史是甚麼，另外一方面又怕你知道這些事情、跟黨外這些人走太倚（uá），會出代誌。

我畢業以後，因為當時畢業的時候台灣經濟不景氣，社會的就職的情況也不好，我就想說那再讀碩士班。因為我在大學時成績袂穰（buē-bái），我就想說來讀碩士班，順利考上碩士班。到了我念碩士班的時候，對於政治的理解已經有一個大的調整。碩士班時我大都時間在讀台灣史，和我的朋友一起去找舊資料，找一些禁書。那時很多書都禁了，像是吳濁流的《台灣連翹》、《無花果》，那時候都禁。但是我的朋友當時都可以找到，譬如說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那時候我們都用影印的；還有許世楷、王育德在日本寫的書，我們都開始讀。所以碩士班那三年，我對於台灣歷史的了解有些增長。碩士班我做台灣史，學位論文是寫台灣文化協會。當時政治系的老師認為阮寫這是歷史，政治學不是做這個的，政治學是在做實證研究、民意調查，要不就是做西方的理論，所以我就找歷史系的曹永和老師，去上他的課，我是曹永和老師指導第一個畢業的碩士學生。碩士論文寫完，許介鱗老師是我的口試委員，看了之後就說：「陳翠蓮，你很有潛力，我幫妳寫推薦信，去考博士班」。阮爸爸也希望我繼續讀冊，爸爸希望說孩子可以再讀書，他就叫我去再讀博士。所以老師給我鼓勵、爸爸嘛鼓勵，我就去考博士班。

當時台灣準備要解嚴，1987年6月，我碩士班畢業，整個社會已經翻天覆地，我就坐不住，不想繼續讀，當時我就想說我先來做記者，我可以觀察這個社會變化的情形。我就去考《自立

晚報》，除了筆試、考寫報導，面試時有五位考官。順利考上博士班後，我就辦休學，我暫時不繼續讀書，先去工作。我想要做記者是因為想要站在第一線觀察現在台灣的變化。解嚴的那時候是很高興，但是我也沒有很了解解嚴是甚麼意思，所有的這些的理解，其實是在報社跑新聞才知道的。我開始做記者時很積極、活力十足，可以報紙半個版面都是我發的新聞，所以長官很重視，半暝長官打電話給我：「陳翠蓮，你可以來報社嗎？有大新聞、大代誌發生」，那是 1988 年 1 月蔣經國逝世的時候，看看錶是半暝三點，長官打電話來叫我去報社。整個社會面對前所未有的狀況，一個統治者、一個威權獨裁者過世，接下來會發生甚麼事情大家也都不知道，接班問題其實沒有很清楚的安排，當時報社的人認為可能政治有一段時間不會穩定，當時很緊張，就把大家找來要怎麼報導這件事情，要做甚麼準備、分工。

我主要負責跑立法院的新聞。當時是台灣變化尚大的時候，社會每天都有衝突，街頭每天都有遊行，所以那陣子我就覺得，做記者能站在社會尚頭前。後來我做了差不多兩年後，就開始疲乏了，因為我們的新聞跟報紙沒有資深記者的制度，記者像是勞工，很嚴重的耗損問題。你每天都在街頭一直跑、一直跑，每天其實做同款的代誌，沒有甚麼累積。做一陣子以後我就覺得說有點累了、疲乏了，只能這樣，我想要做專題報導，但是報社沒有這種制度，報社養一個記者，但是平時沒有在寫新聞，久久才寫一個專題報導，這樣報社不合算啊。我就開始想說我可以做甚麼？所以幾年後就回到學校讀書，因為休學只能休兩年，我就一邊讀博士班課程一邊繼續做記者。

修完課程後，開始寫論文。做記者有一個好處就是說，你有

很多機會可以收集資料，譬如說我利用那個時機去中國、去美國，我開始想要以二二八事件做博士論文的主題，這些所在都可以讓我收集到那個時代相關人物的資料，因為很多人在二二八之後跑去中國，八〇年代之後有一些人在美國。這段過程對我來做研究還是做博士論文都有幫助。

寫完論文之後，我覺得自己可能可以做研究的工作。但是當時找工作，因為我的學位是政治學博士，但我的論文是做台灣歷史，開始找頭路的時候，我民國八十三年畢業的，要找頭路時很困難。我找政治學相關科系，政治學的說妳的論文不是寫政治學的，啊我去找歷史學相關科系，像我曾到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找頭路，當時剛成立籌備處，他們說：「你是政治學的、不是歷史學博士」，結果我都找不到頭路。後來只好回到新聞界，所以我有一陣子去《中國時報》。因為我本來那個報社《自立晚報》在1990年代經營不善，被國民黨的人買去，新老闆是台北市議員陳政忠。頭路沒了、報社也沒辦法回去，有人找我去《中國時報》。在中國時報的那一陣子我真的覺得很痛苦，這個報社跟我在自立晚報的情況差很多。自立晚報的狀況是鼓勵記者盡量去報導，你可以採訪到的新聞盡量給你去發揮。中國時報就是你不能這樣寫、你不能那樣寫，把你的稿子改得很嚴重，但是又掛你的名，所以我覺得很痛苦，做不下去。

後來有一個機會，就是淡江大學的公共行政學系，雖然我不會想說我會去公共行政學系教書，當時淡江公行系需要一位西洋政治思想史的老師，我是政治理論畢業的，政治理論組的，雖然我是做台灣史，但是教政治理論。那時候我正需要工作，所以我就去了。公行系請我教西洋政治思想、教中國政治思想，這以前

在學校都學過；說要教政治學，好，我沒問題；說妳曾經跑過立法院，那妳可以教立法論嗎？我說都可以，因為我很需要這份工作。所以我一開始去公共行政學系教書，當時就要準備，大量的準備，哇，當時有一陣子的時間我都放在備課上頭，政治思想要自己重新讀。大學時聽學校老師講，但是我自己讀的時候才發現老師講的有問題。因為要講給學生聽，自己要讀通，不然學生一問你就破功了，所以花很多時間在備課。有一陣子我想要做的研究就沒辦法進行，差不多就要過很多年，我在淡江教十年，所以可能五、六年的時間沒法度有甚麼研究進度。當時我如果一年可以好好寫一篇、兩篇跟台灣史有關的論文，我就覺得很不簡單了，就是要用寒暑假的時間。雖然在公行系教書，但其實我都跟歷史學的人作伙。當時二二八研究已經開始變成很重要的議題，所以我就開始作一些口述訪問，差不多到 1990 年代下半期開始作口述訪談。

惦惦聽、輕輕說——初入口述歷史

我在做二二八研究寫博士論文的時候，我就開始作訪問，但是我當時不知道該怎麼作口述訪問，不知影要怎麼跟人問。有一些關鍵的人，我就只有看史料，有一些人當時還健在，譬如說陳逸松¹⁵。這個人在二二八處理委員會裡面，他是一個很核心的

15 陳逸松 (1907-1999)，宜蘭人，日治時期律師，戰後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協助中國政府接收台灣，出任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1960 年代赴美居住，1970 年代前往中國，擔任人民代表大會委員、政協委員等職。

人，當時他人在美國休士頓，所以我就打越洋電話去作訪問。其實我不知影要怎麼作訪問，比較像記者在問的方式，所以不是從頭到尾仔細訪問，那個訪問其實很簡單，只有問一些核心的、關鍵的問題。問他說在處理委員會裡的角色，那時有一些資料出土，顯示他好像有跟政府有合作的關係。所以我一開始作口述訪談其實沒成功，比較像記者在採訪，不像口述訪問。另外一個就是問林衡道，林衡道戰後算比較少年，伊爸爸林熊祥被人抓了，爲了要保他爸爸出來，所以他就跟國民黨政府有一些合作。我去跟他問的時候，他都不愛說。所以那個採訪過程也都沒很成功。

以前當記者時，主體性比較強，記者是有問題我要知道答案，他不會去問頭到尾，不會去問你的生平，他只會問幾個問題，他想知道的，甚至只問你說「是還不是」。所以他的動機性很強，伊直接要答案而已，伊不需要去知道來龍去脈，這些對伊來說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有衝突點，你在說的東西越刺激、越衝突，伊尚愛，哈哈，所以記者的角色是這樣。歷史研究者做口述訪問，則是當作一個歷史材料，所以希望是越完整越好，希望受訪者自己的來龍去脈、伊的背景、伊怎麼參與這些事情，越細節越周到越好，記者對這些不關心。所以我剛開始要作口述訪問的不成功原因與這個習性有關。我直接要問陳逸松說：「你在裡面是甚麼角色？」他才不願意講啊，因爲他會閃躲啊。所以開始的訪問很簡短，不是很成功，我覺得記者與研究者兩個角色差很多。就是說我們在做歷史研究時，受訪者是主體，記者則是自己有很強的主導性、主宰性，記者本身就是主體。

這是最開始作的訪問。後來我開始研讀中研院近史所出版的、或張炎憲老師所作的很多受難者的訪問，我才開始覺得：原

來訪問是要這樣作，從頭到尾這個人是甚麼款的背景，伊爲什麼跟二二八事件有甚麼關係。我看到您寫的才知道口述訪問要這樣作，所以才開始學、開始作，因爲當時還很多人都是很健在，所以才開始作各方面的口訪，二二八之後就接著作白色恐怖相關的人的口述訪問。做白色恐怖有關的訪問，主要是因爲咱做二二八的研究之後，台灣歷史研究差不多 1990 年以後，對戰後的威權統治開始在挖掘，做二二八很自然就往後延伸，知道說受害者不是只有二二八，有很長的時間是白色恐怖，很多老師開始做，譬如說是張炎憲老師就開始做，我的研究跟當代相關，所以開始做口述訪談是在 1990 年代。

初期是二二八紀念館有做一些研究案，那陣子是要替這些受害者保存您的影像，所以我連續做三期的訪問，做二二八的受害者。因爲連續做很多期，受訪者的對象就變成往後延伸至白色恐怖有關係，那時曾經訪問過甚麼人？譬如說劉明¹⁶的女兒劉心心；譬如說郭琇琮的太太林至潔，伊也是白色恐怖的受害者。雖然是二二八的紀念館，但是也有做白色恐怖的訪問。就越來越多這種研究案，政府就開始支持這種口述歷史的蒐集跟採訪，所以研究案就越做越多。我覺得 1990 年以來所做的口述訪問有幾個重點，一個是說二二八，後來做白色恐怖，另外有一些人去做有日本時代經驗的老人家，您戰爭時陣的生活，像是台灣人日本兵，所以我覺得差不多咱二十多年來做的這三個重點。二二八跟

16 劉明(1902-1993)，嘉義人，工程師出身，戰後協助國府接收台灣。後來向基隆顏家承租金瓜石的礦場，開採金礦並致富發跡，陸續經營新店等地的煤礦，成爲礦業鉅子。保密局的情治人員羅織罪名，構陷劉明資助共黨人士，於 1949 年 12 月左右加以逮捕入獄，沒收其財產。

白色恐怖的重點與內容有關聯，關心的主題也很相關，台灣人日本兵跟這兩個主題比較沒關係。

二二八或是白色恐怖，很多受害者犧牲以後，咱可以找到的人就是厝內的人、太太和囡仔，所以很自然都是做這些受害者的家屬，尤其是女性。二二八紀念館做的也很多都是女性的家屬，這不是我特別去選的，是自然的結果，因為男性都犧牲了。最近一次，就是許雪姬教授在做的人權紀念館籌備處的案子，就專門在做女性，那是最近在做的案，之前我沒有特別選擇去做女性的訪問，是很自然的結果，都是受害者的家屬，受害者的家屬就都是女性。我印象中的訪問男性較少，為什麼男性比較少呢？我沒有特別去想過，也有一個可能是男性比較不願意講，女性比較願意講，我想應該是這個社會對不同款的性別的對待方式有關係，社會比較允許女性說出悲慘的經驗，我們的社會比較不容許男性的訴苦，女性比較有一些空間可以說她受苦的心情。

口述歷史的內容，我覺得有很多同樣的情節，例如受難者在那個社會要怎麼掩飾自己，不要給別人知道，我的過去、我內心的代誌不要給人知道，在咱的政治體制下全民都受害，人們的心靈結構很扭曲。到後來，我爸爸甚至會給我幫忙，差不多 2000 年以後，台灣的政治比較正常化以後，家人都知道我在做甚麼研究，他會很支持，他會去把他的朋友有甚麼人、老師、囡仔甚麼人曾經是白色恐怖的受害者，爸爸會幫我找可以訪問的人，很積極就對了。

史家的技藝—用口說、耳傾聽、手紀錄、眼見證

我覺得做口述歷史，有很多基本要準備的事情。第一個，你要訪問的這個人相關的背景跟資料，在去做之前我就要把有關的資料都先讀，讀完之後可以找到關鍵的問題點，我想要跟對方查證的事情，希望對方可以說詳細一點。這些前置準備的事情很重要，會關係到你做口述訪問深入的程度到哪裡，有可能很多人都訪問過個人，他就會 repeat，一直說一樣的事情，伊就會套他自己的方式，這樣的訪問就很形式，就沒有辦法往深入去挖掘。所以第一個準備工作很重要，就是盡量去找出受訪者曾經做過甚麼樣的訪問，不同的時間做的訪問中間有甚麼問題、重複或矛盾，可以再去查證，請對方就某些方面再深入一點去講，所以這些準備工作很重要。

訪問過程之中有些是跟經驗有關係，你累積越多次的訪問，你就越知道說訪問怎麼進行。第一次、第二次開始訪問的時候，沒有那麼熟，我們要多尊重他一點、禮貌一點；信任的關係建立了以後，第三次、第四次你就可以提出比較尖銳的問題問他。要注意的是，尖銳問題要適時丟出去，不要讓對方覺得不舒服，我覺得這跟經驗有關。口述訪談不是只有一直講一直講而已，不是這樣，我們還要先看一些東西，受訪者的矛盾的地方、不確實的地方，因為我們要正確的訊息，就是要適時的反詰，但是那個反詰又不能讓人覺得不舒服，不然就講不下去了。所以我覺得這個眉角 (mê-kak) 就是要看訪問者與受訪者的信任程度到哪裡，還有整個進行的順利與否，在適當的時機丟出比較敏感的問題，這個就是眉角。訪談能不能夠跟別人不一樣，有進一步資訊的收

獲，這都需要經驗。

特別重要的受訪者我都會盡量自己聯絡，比較例行性的就跟助理講清楚，要怎麼聯絡。剛開始做的時候比較沒有經驗，就是讓助理去聯絡，聯絡就會有一些落差，對方比較不了解你要做的。本身跟助理的配合是一件事情，這助理要怎麼去跟人講，我們要先跟助理說清楚，所以助理也是要先訓練，有的助理也是很官僚。這是第一點。第二點你要跟對方建立信任的關係，你就要自己去連絡比較好。所以如果研究案讓助理去連絡，要先做資料的整理，還有跟他助理清楚要怎麼跟對方聯絡。有一些其實不是研究案，是透過私人的關係找到的受訪者，就要自己去聯絡，讓對方可以信任。

如果是研究計畫就要有成品出來，要請助理去整理，助理要怎麼作呢？通常我在訪問的時候自己會做筆記，助理整出來以後，因為我自己有做筆記，就知道整出來的內容如何，這是研究案。如果不是研究案，是我自己論文或研究需要去找一些人，我不一定會做完整的紀錄出來，因為逐字稿對我來說不是必要的，通常我是留訪談的錄音稿，但我有做筆記，有的時候我會把訪談內容重點自己整理出來。有助理的部分主要是研究案，口述歷史的研究案，我自己做論文、做研究的時候則是我自己從頭到尾自己做。如果是研究案的話，整理完都會給對方看。如果是自己做的通常是沒有，但是有一些受訪者會希望說你問了以後到底如何，我就會把我整理的東西寄給他看。其實那是給對方有一個信任，知道你問完之後不會沒下文，我會整理出來也讓他保留一份他受訪的紀錄。

如果是要公開出版，受訪者希望要刪掉的部分，我都會尊重

他。有一次訪問劉明的女兒跟女婿，那次的訪問算是很成功。那次葉英堃先生講了很多他在二二八的時候跟台大醫學院的學長、年輕人的行動，伊就說了很多、說得很高興。但是，第二天透早六點多，他就打電話來，說伊昨夜一整夜睡不著，伊覺得講太多，他怕公開以後對他的學長不利，可以看出老一輩的陰影還在，害老人家晚上睡不著，透早打電話跟我們講，希望我們不要寫。我覺得完全可以尊重，他們願意讓我們訪問已經很感動了，訪問時他一發不可收拾，但是後來想一想覺得有疑慮的時候，我都會尊重對方，這些就不要整理出來。

我不曾遇過受訪者不願出版的狀況。因為這些受訪者不是一次的關係而已，我這次跟你做訪問以後，整理出來他看怎樣，不管同意不同意，下次還要再來做訪問，因為可能別的問題還要再來問。或是以後做研究到一個坎站（khám-tsām），這些問題會回來在繼續問。如果你把受訪者當做一次性的使用就不好了，通常我是覺得受訪者他要或不要、他考慮的，因為我們不是主體，只是保存紀錄的而已，伊願意要讓我們知道多少，就要尊重他。所以到現在為止，還沒有遇到不同意出版的人。就是說要讓對方信任，你是善意的、你是爲了要做歷史資料的收集，希望伊來幫忙。你不能硬要他怎麼做，我覺得這是真沒禮貌的事情。

以前很好笑的事情是，我博士論文寫二二八，就聽到有人傳話說：「陳翠蓮怨兜（他家）就是受難者家屬，所以才會去做二二八研究」，其實阮家族根本就沒到那個位置、沒那麼重要，去給人家迫害。那時陣受迫害的很多都是比較菁英、有讀書的，阮家族的人是見證了那種壓迫的過程。頂多就是媽媽怨一些朋友、老師、校長介紹這些人給我做訪問，但不是親戚。

失敗後的淬鍊—口述歷史的美麗與哀愁

90年代開始在做口述訪問，聯絡的過程常常都會沒成功。除了本人不願意接受訪問，常常就是家族的壓力，厝內的人、囡仔不要他出來受訪。只能努力說服、讓對方信任，這樣比較會成功，但即使是這樣也是常常會不成功。我有一次比較特別的經驗，去基隆那邊，那裏有一些做炭坑的人，有一個受害者本來決定要接受訪問，已經是八十幾歲了，1995年代，七、八十歲了。伊說有看到軍隊從基隆進到台北的過程、怎麼鎮壓的過程。那時陣要去做，結果到了基隆，去到了恁家，那位受訪者有一點狀況，說沒辦法正常跟你說，有一點精神陷入混亂的狀態。「來啊！來啊！恁來啊！」然後趴倒在地上，結果這個訪問就沒辦法繼續。那時我覺得很難過的是，我們要訪問的人，似乎因為我們的採訪想起了那個過程，結果整個人就有點失控。我們試圖安撫，他的家屬也在，但是那個過程沒辦法讓他 calm down，伊就是這樣害怕的狀態。所以我們在那裏待了好一陣子，又有攝影機，我覺得很殘酷。就是那個樣子，那時候覺得自己好殘忍，要他回憶、要他回想這個痛苦過程。那次的經驗，完全沒有進行訪問。但是我的感想就是，你看這個事情，即使過了六十年、七十年，八十歲左右的老人，你要問的這個事情，他的反應是如此，你就可以知道二二八事件對台灣人的傷害有多深。

跟陳逸松做訪問那次也不成功，那時候是用越洋電話，因為是第一次做口訪，不懂得要從頭到尾請他把事情做一個完整的交代，但是一些關鍵的問題是有問到，那次不算很失敗，主要是說那是一個越洋電話的訪問，所以其實也沒辦法講一兩個鐘頭。那

是最開始的經驗，後來有一些訪問做得不好，訪問史明就是一個例子。我覺得那次訪問不成功的原因是跟他沒有溝通好，那是一個研究案，只打算跟他做一次、兩次比較短的訪問，訪問重點是他的白恐經驗，不是要做他的一生，那從頭到尾可能要十幾次。但是，沒有溝通好，他一開口就他話說從頭。那次的訪問計畫差不多是一次還是兩次這樣，還有錄影。所以我覺得那個事前的溝通很重要，我們的口述訪問的主題是甚麼，因為不是所有的口述訪談都一樣，從頭到尾讓對方說得很詳細，不是這樣。有的口述訪問是主題式的，我特別想要知道哪一件事情，如果可以的話，最好是可以把我要問的重點題目讓對方看，我打算是要做幾次的訪問。如果有事先的溝通，他知道我們要做甚麼，這樣配合起來比較好。因為史明也是有一個癖（phiah），因為伊是一個革命者，「我在講，妳插甚麼話。」這樣伊就很高興，我急著想要問重點，不是插一次話而已，想要把問題拉回重點，我就試一次、兩次，結果史明就生氣了，他就說：「恬恬（tiām-tiām）！是我在講還是妳在講？」他講的話也是有一些臭彈（tshàu-tuānn），所以那次訪問根本沒有問到我想要知道的事情，他就說他古早家佇士林，他爸爸怎樣怎樣，我就跟他說哪一個資料上我看到是怎樣，就火上加油，過程就變成這樣。我又想拉到回戰後他在做運動的代誌，因為一開始關係就沒打好，所以變成那次訪問就沒有成功，因為他認為我沒有耐心聽他講，沒有尊重他，變成約第二次就不順利，那個訪問就沒有再繼續，可能是一次最失敗的訪問。

所以訪問前置作業很重要。再來，尊重對方的性地（sìng-tē）也很重要，如果說爲了要讓訪問成功，對方的性地怎樣、去配合他的性地可能就會比較順利。那時候可能也是因爲比較年輕，我

覺得這是比較失敗的原因。後來我就慢慢比較知道在做口訪的時候，主體是對方，我們不要一直把對方糾正「不是喔，我看過你的資料喔」，就算他說的有一些灌水、膨風，刻意的遺忘或是閃避，我們也不用去戳破，我們的目的不是爲了要證明你說錯，我們目的是讓受訪者願意講。我開始知道，就算你明顯聽到伊說的有問題，也不要直接把他戳破。所以，那次經驗也是有給我一些幫助。

有一次最困難的訪問是要給戒嚴時期不當審判補償基金會的一個處長劉衡慶¹⁷做訪問，他是警備總部軍法處的人。那時陣有很多白色恐怖口述訪問，問過很多受害者，但是都沒有加害者。那時知道當時不當審判補償基金會有很多個都是本來在警總轉過來的人，因爲這個研究案是不當基金會委託的，我記得是這樣，他們希望也訪問到警總的人，在不當審判基金會工作的劉衡慶也同意了。那次的訪問做的不是很好，就是咱對警備總部在白色恐怖時期的角色、細節、資訊很少，所以去訪問的時候就變得很困難，你被帶著走。很多事情他不願意深入談，再深入追問他就閃躲。但是你沒有辦法準確地提問，因爲你所了解的資訊很有限，所以那次跟劉衡慶做的訪問不是很成功。因爲伊講的事情你不知道要怎麼追、怎麼挖，這個是對還是不對，背景知識根本不夠；或者再追問，他就閃躲、否認，問不下去。所以我覺得那次很可惜，他是很少數在體制內而願意接受訪問的人，雖然他願意接受訪問，但他沒有真正說出他知道的事情。這就是我自己功力不

17 劉衡慶，1942年在四川重慶出生，軍法學校法律系畢業，曾任警備總部軍法處副處長，戒嚴時期不當審判補償基金會代執行長兼法律處處長，現爲律師。

夠，關鍵就是，第一，對警備總部了解太少，我問他說警備總部的分工是如何，他就回答得很籠統，你知道他說得太籠統，但是沒辦法追問。你知道他說的不是實情，但是不能追問，所以那次的訪問我就覺得很無采（bô-tshái，可惜）。他講一個很籠統的東西，那個東西你沒有辦法進一步把他變成我們以後研究可以用的基礎，我覺得很可惜。

因為當時警備總部的資料我們根本都拿不到。資料都沒有，所問到警備總部的組織分工，我知影說有監聽、檢查郵件，但是你繼續問的時候他就閃到旁邊去。這個人後來就離開不當審判基金會，去做律師。後來我看《壹週刊》去訪問他，他也沒有進一步說出甚麼。這就是台灣荒謬體制的典型，白色恐怖時期他在加害者體制裡，後來卻到不當審判基金會，但是沒有透過伊的口中去講更多舊體制的訊息。其實去訪問的時候就他很防衛，我跟他追問的事情，他已經很防衛了，你又沒有更多的資訊去旁敲側擊，所以他說出來的資訊完全是他想講的範圍內，沒有辦法突破他的心防。一個成功的口述訪問是我想要知道的事情，你問伊就會全部都說出來，還可以深入地挖出沒有想到的訊息。當時沒有那個能力讓他多說一些，所以那次的訪問就覺得很可惜，很形式、講得很有限，各位可以去看近史所《口述歷史》第十二期。¹⁸ 那時陣陳儀深老師就說妳去問，妳是女生去問對方比較會說，陳儀深可能認為他自己的色彩比較明顯，對方會防禦。但其實沒有因為女生去訪問，他就比較不防禦，沒有，真的很可惜。

18 陳翠蓮訪問、林東環記錄，〈劉衡慶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第十二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2004），頁 387-398。

做口述訪問的訪談要做到多深，就是要看你的準備多少。所以咱欲去做口述歷史訪問之前有兩方面的資料要看，第一個是要訪問的這個人、及訪問主題相關的資料；第二個是他曾經接受過甚麼樣的口述訪問，一次、兩次、三次？這裡面的資訊是有一貫性的嗎？爲什麼這麼一貫？沒有一貫的說法，出入又是在哪？所以我覺得準備工作就是這麼重要。咱的準備工作做得周到的話，一個口述訪問不是接受訪問之後就好了，而是要看訪問者他可以挖多深。還有一個重點就是我們問之後更重要的是，從這個人還可以往外延伸去找甚麼人。所以不是只有問他知道的事情，盡量問「某某人你認識嗎？」「你在這個學校，那這個學校有甚麼人？」「你可以介紹幫我嗎？」就是咱如何把這個人當做一個點，然後繼續擴大訪問對象。後來很多訪問者幫我介紹還有甚麼人可以問，這樣幫助很大。伊說的可能是這個故事的一部分，但是伊的朋友可以再擴散開越多面向。如何透過這個受訪者去介紹跟主題相關的人，我覺得很重要。我覺得這是一點點累積起來的，我們開始做二二八的訪問，訪問之後還能問他有沒有認識誰？可不可以介紹？那是一點一點介紹的；一方面你關心的主題、資料，裡面出現過的名字，我們在做口訪的時候要把你做的研究跟先前讀的東西要連起來，可以多問一兩句：「那某某人你認不認識？」你可能就會有意外的收穫。所以要把我們讀的東西盡量把這些資訊做交叉比對，這樣可以拉開的線會越來越多，問越多，大家都會知道你在做甚麼研究，就會有越多人願意信任你，就會互相介紹。

口述訪問常常會有出現說錯的時候，因爲記憶的失誤或把別人的記憶當作自己的記憶，尤其說同一件事情每個人說的不一

樣，我覺得這是常常出現的。我們在做口述整稿的時候其實是要呈現受訪者要怎麼說，因為是他的記憶，他的記憶是不是正確，我們可以用補充的說法，加註說明：「可是……還有另外一種說法是甚麼」、「可是檔案裏面呈現的說法是怎樣」。我們可以用加註的方式呈現，不是直接去糾正他。或者說跟受訪者的關係很好的時候你可以問說：「猶毋過（iáu-m-koh）另外一種說法是甚麼」，也許他會想到他的記憶是錯誤的。通常我們是用註釋的方式，不會直接去質疑他的說法。當然還有一個方法是，我們知道他說錯了，可以直接問他，但是這要有信任的基礎，不然他就會：「啊是你比較知道？還是我比較清楚？」、「我是當事人？還是你是當事人？」所以如果要直接查證的話，是要有信任的基礎，有時我們沒辦法直接質疑的情況之下，可以用註釋。

像是二二八事件常常看到很多人都說國民黨軍隊掃射，但是卻分布在不同地區，像這樣我們要如何印證？就可以繼續追問，怎麼掃射？具體情況可以告訴我嗎？因為他說的可能是聽來的，叫他具體講的話，就不一定講得出來了。所以可以用追問的方式，「那時候你人在哪裡？」「你看到的是如何？」、「你受害的過程是怎樣」，到時候就可以分辨是大眾共同的記憶，還是親身自己的經驗。

我後來覺得受訪者的心態很重要，他願不願意說很關鍵，像劉衡慶，因為本身那個計畫就是不當審判基金會的計畫，是因為這樣所以他不得不接受訪問。當時聯絡過誰呢？都是跟美麗島事件有關，有聯絡過林輝煌¹⁹，就是美麗島事件當時的軍法官，當

19 林輝煌，美國杜克大學法學博士，曾任美麗島審判法官、法務部政務次

時有一份擬訪對象名單，但是名單上大家都拒絕。因為那是不當審判基金會的案子，等於他是被推出來當作代表的，不能都是受害者，訪問裡面要有體制內的人。所以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來接受訪問，其實伊根本就不願意談，因此他受訪的時候很防衛，心理武裝很強，稍微進一步問，他就一副要生氣的樣子，所以那個訪問很困難。所以口訪能不能成功跟受訪者的態度很有關，如果是這樣子我覺得很難，即使我們後來知道的事情比較多，再去問，恐怕只是會跟他吵起來。所以跟受訪者的意願很有關係。

矛盾扭曲的台灣人—我的爸爸

我想很多台灣人都像我爸爸一樣，就是伊對戰後這個世界的變化，台灣人所受的委屈，他有一定的體會。那時陣戰爭剛剛結束，伊十三歲，十三歲的囡仔哪知道甚麼事情，但是這個時代的轉變他都有看到。所以他對公共事務的關心，有時是人的性格，並不是所有的人都這樣。阮爸爸沒讀甚麼書，家族裡其實沒人受害，但是對台灣政治的變化會特別關心，所以我覺得可能是個人的特質。

我覺得我跟爸爸其實很像，雖然厝內沒有人從政、也沒有人受迫害，但是我差不多初中、高中開始，就對政治議題特別關心。例如看報紙，很奇怪的是，我主要都是看第一版、第二版，女生很少這樣，在讀中山女中時期就跟別人不一樣。我覺得其他

同學很奇怪：「國家就快要滅亡，恁怎會都沒關心？」我在學校裡面其實有一點異類，我想也是跟個性有關係。

我爸爸就是最典型的台灣人，行爲模式很扭曲的那種典型。伊後來賺很多錢，伊蓋別莊，裡面就有一間密室，裡面都放禁書，大一點以後我都進去裡面看，因爲很多禁書都在那裡，這些東西後來都變成我的史料，哈。因爲當時黨外雜誌、禁書每期都買，伊買得很全，當時黨外的雜誌伊差不多都有了。但是伊也驚人知影，伊對黨外同情或捐錢給他們，攏沒有公開。不是只有這樣，因爲伊有賺一些錢，所以國民黨黨部都來找他，因爲地方他有認識人，伊開工廠有很多員工，選舉有時錢會從他這裡幫忙送出去。但是伊自己的錢就去捐給黨外。伊去幫國民黨助選，但是告訴我們「咱家的人只能投給黨外」，所以我覺得我爸爸就是最典型的威權時期的扭曲的台灣人。伊對國民黨的態度就是伊的生存策略，伊要做生意，所以需要人人好，政治立場太清楚會害他不能生意，他要去做公家、農會的生意，跟他的關係要建立，啊不然他的電器電話就不用賣了。伊會去幫國民黨助選，那是他的生存之道。但是他真正的想法是，伊跟伊的孩子、家人、親戚，票不能投給國民黨。他甚至反對我跟外省人交往。我大學一年級的時候跟外省人交往，一位外省同學，阮爸爸伊就抓狂，怎麼可以跟外省人在一起？「剝剝去給豬吃好了」，伊這樣講。我完全沒法度了解，「可是，我們班上本省人比較聳(sông)，外省人比較高級」，我這樣回答，我爸氣到要跟我脫離父女關係。所以我覺得他就是最典型的性格扭曲的台灣人，對外要生存，但是內心有伊的想法。

對轉型正義的看法

轉型正義的事情國家機關要介入、主導。咱在講轉型正義不只是民間的事，很多部分要國家願意做這件事情才會達成。第一部分是國家願意做檔案開放，我們才知道原來發生過什麼事、才知道我要怎麼追問、挖掘問題，但這些，我們國家不願意做。到現在為止，檔案送到檔案管理局，理應開放了，但事實上他又有很多限制。第二個是轉型正義必須由國家機關要求當時體制內的人出面，你有責任出來講，因為你當時是執行公權力，但國家根本怕民衆知道過去的事，所以不願透過體制的方式要求這些人出來說明真相。所以咱的問題是這樣，爲什麼南韓或是南非他們體制內的人願意出來說，是因爲國家用公權力來轉型，你必須出來面對，你不出來講會被判刑、被司法追訴，差別就在這。咱的統治當局根本不願意這段歷史被知道得更多、或是更完整的呈現。

譬如說南韓跟南非的經驗就是你出來面對，坦白從寬，你出來講，法律不追訴你；但如果你不出來講，就要負擔法律責任。他們是用這樣的方式，就像我們說的汙點證人，類似這樣的概念，你願意講清楚，你可以不受法律追訴、可以寬恕你。我們都沒有來自體制的壓力，爲什麼要出來自己找罪受？爲什麼要出來坦白，讓大家指指點點知道我參與過去的迫害的工作？

我覺得歷史審判的時機已經過了。在1987年解嚴、1988年蔣經國過世，新的統治者上台，那是一個時機。李登輝的做法是，因爲我是國民黨黨主席，雖然是本土派，如果要清算自己的國民黨的加害史，這樣我還有甚麼資格站在這裡繼續統治，所以他選擇的是「往前看，不要往後看」，不要去追究國民黨的黑暗

史。還有一個時機點是 2000 年阿扁總統上台的時候，我覺得他是沒有歷史意識的人，他是一個倉促情況下、沒有完全準備好就上台執政。所以他上台之後第一個拜訪的人是王昇²⁰，王昇就是那個威權體制 80 年代的劉少康辦公室²¹的負責人，他就是恐怖統治的黑手。陳水扁上台後第一個去拜訪他是什麼意思？不就是暗示「不要怕，我不會追究」、「我們和解」。所以就是兩個時機 1988 跟 2000 年，2000 年那個時機他上台有打算要做轉型正義工作還有機會，雖然阿扁在檔案開放有努力過一些，但是在他上台之後就是不要責任的追究才去拜訪王昇，所以我覺得咱的時機其實已經過去了。那些人到現在，主導的加害者人都過世了，審判已經都不可能了，有一些比較下面的、附從的加害者都跑掉了，例如跑去美國了，還有一些是檔案沒有完全開放，我們根本不知道是誰。所以法律的追訴已經沒有甚麼機會了，可以做的就是把檔案更完整公開，可以不斷的提醒過去所犯的過錯，我覺得可以做的是這些。

但即使是這樣，還是有可以做的轉型正義工作。以西班牙為例，西班牙在佛朗哥政權垮台之後，就不要追究過去、試圖遺忘、向前看，但是三十年後發現沒辦法，社會衝突太嚴重了，所以在 2003 年終於通過一個〈歷史記憶法〉，但是沒有辦法追究司法審判的事情。〈歷史記憶法〉裡面規定你不能去紀念加害者佛

20 王昇(1915-2006)，曾擔任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劉少康辦公室主任、巴拉圭大使。

21 劉少康辦公室，由時任國防部政治作戰部上將主任王昇設立，組織成員來自國家安全局、外交部、行政院新聞局、國民黨中央黨部大陸工作會、社會工作會、文化工作會，組成跨越黨、政、軍、特，權傾一時。

朗哥，佛朗哥的銅像要拆掉；他的墳墓不能去朝拜，不能像馬英九一樣每年去給獨裁者致敬，不能做這些事情，法律上是禁止的，相反的受害者可以去那裡抗議、鞭屍。所以我覺得咱可以做的跟西班牙比較像。

你要處理這些人，要他們在司法上負責，已經沒有辦法做了，甚至到目前為止我們的生活空間還在威權控制之下，獨裁者蔣介石的銅像都在啊，紀念館都在啊，咱的教科書、咱的中正路、中正大學，這些向獨裁者致敬、紀念的符碼都還在啊！咱可以做的其實就是這方面，就是歷史記憶的清理、公共空間正常化，我覺得咱可以做的就是這些，法律追溯已經來不及了，但是要搭配檔案的開放，所以我覺得還是要公權力願意推動。不知道現在有沒有機會，民進黨如果重新上台，不知道有沒有要做甚麼轉型正義的工作，我是比較懷疑，我覺得他們的歷史意識很薄弱。

正義來到以前

我覺得這兩次，2000年、2008年兩次政黨輪替是台灣人在練習怎樣透過民主程序，不流血的輪替，我認為只是練習學習民主運作而已。我剛剛有說2000年當時的在野黨、1986年成立的民主進步黨是在準備不充分的情況下，就上台執政，他們自己也可能沒有想到。在匆促的情況下上台，那個執政很多方面是失敗的，很多方面都沒有準備、也沒思考好，可能第一次拿到政權時，那四年沒有想清楚；但後來總統連任，變成八年執政，所以

八年的時間如果準備充分，有一個施政的優先順序，有可能對我們的體制有一些根本性的轉變，但是都沒有，所以很快的，舊威權體制的人又重新上台了。其實台灣人是在學習，只有學習到甚麼呢？學習到用不流血、用選票的方式、願賭服輸，我覺得我們只是在學這個過程而已。你看從 2000 年到 2008 年的過程中，也有願賭卻不服輸的人，不願承認大選的結果，在那裡亂，好幾次都很危險的過程，但咱的社會其實很不簡單，在強大壓力、緊繃的社會張力威脅之下，沒有發生衝突，真的很不簡單。所以這兩次我覺得是練習，讓大家學習接受投票的結果。

因為已經政黨輪替過兩輪了，誰要上台大家可以接受，再來要做的就是，接下來要上台的人必須好好地打算應該做些甚麼事。不過我是這樣看，朝野政黨的目標都只是要執政、掌握權力，至於拿到權力要做甚麼，追求甚麼公共利益，似乎沒有好好想過，所以很可惜。檯面上這些政治人物沒有真正把國家的發展當作重點來思考，我們便一直在蹉跎時間、社會內耗。

人權博物館到現在為止做的都比較被動，主要做的就是把錢分一分，意思就是預算分給一些團體、做口述訪問、策展、做計劃，其實很多口述訪問很多都進行過了、一直在重複。我覺得很可惜，可以做的事情不只是這樣，例如還有一方面就是檔案的開放。人權博物館應該可以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人權博物館跟檔案局的關係，現在很多東西送到檔案局之後就很難看到，那人權博物館這邊可以比較積極的取得檔案，透過做研究案，將檔案的公開，這個我覺得可以去進行的。

到現在為止看到的都形式上有在做人權工作，因為這是政府的角色，我們剛剛在轉型正義上有提到政府的部分，譬如說人權

博物館獲得的不當審判基金會檔案的轉移，這些檔案轉移到文化部那邊就沒有了，也沒打算開放或是怎麼樣。對於轉型正義工作的推動沒有甚麼積極的動作，讓人覺得人權博物館的角色很被動，都是在做資源分配、消化預算的工作。另一方面，他們可以去做的就是去挖掘、披露體制內的人，我們個別去找他們不會願意出來講，但這是政府應扮演的角色、政府所擁有的權力。譬如說研究案就要用這樣的方法去推，但現在都沒有再做，多數是重複過去已經訪問過的，所以我看的都是比較被動、比較形式化、而且就是常常做 Routine 的工作，有點可惜。

我們的社會其實對白色恐怖受害者的關懷很少，受害者本身組了聯誼會，主要是他們之間互相的照顧。我們的社會對這些人重視的程度很少，甚麼時候會想起來呢？就是在紀念日的時候，有個儀式這樣而已。大部分的時間社會對這個不重視，這也是我們人權博物館可以做的事情，我們可以怎麼樣透過不斷的活動，讓受難的、過去的歷史或是奮鬥的過程、或是有些為臺灣社會付出的人，我們怎樣讓台灣社會不斷記憶這些人，這是人權館應該努力、主動去做的。我覺得我們做的還是很少，例如爭取在學校的教學裡、甚至是教科書裡面，這我們都還做得少。說起來，人權博物館是把自己的工作限縮在很有限的範圍裏面。

那怎麼關懷受害者呢？我想有很多面向，譬如說博物館，博物館和主政者其實很重要，如何透過教育的方式把這些都串起來，我們的下一代才會對我們有這段共同受害的歷史有記憶，這段過程可以變成我們共同的歷史記憶。最近不是有陳澄波的新聞

對吧？²²，這就是很典型的，我們的社會對這些都不知道，我們很容易知道梵谷、畢卡索他們的畫作，比對陳澄波熟悉很多，其實就很清楚呈現我們對自己歷史的生疏。這些的工作都要再持續。最近有很多民間的基金會都在推動這些工作，紀念活動、辦營隊，相對之下，掌握資源的政府可以有更積極的角色。我們的問題是執政者並不願意、或者不積極這段歷史被大家深刻記憶，比較多的時候是不得不，做一個形式上的道歉，有口無心。我們現在的問題其實是這樣。

如果整個社會，統治當局沒有把轉型正義當做一個重要的事情在做，甚至企圖要改課綱，回復到舊的歷史敘述方式，整個台灣社會對台灣歷史的理解就是越來越疏離，更不用說關心這些受害者跟他的家屬。所以這是整套的，從統治、宣傳、大眾的感知到教育的體系裡面，整個都要連起來，這樣社會對這段五十年、七十年的歷史才能真正重視，甚至我們會尊敬這些人願意在威權統治時期、在艱難的處境下站出來犧牲自己。我覺得這是整套的，現在看起來我們的社會沒有往這樣的方向走。

這兩年來針對課綱問題，台灣史學界一再努力，連署、開記者會，可以說可以做的都做了，目的就是要提醒社會，小心現在正在走回頭路。五十年前的史觀，現在要我們用這樣的方式來記憶抗戰七十年？這與台灣社會大部分的人的記憶是沒有關聯的，但是國民黨統治者他執意這樣做。甚至少年一代跟我們這個世代

22 陳澄波畫作遭竊事件，陳氏在二二八事件後處決，記者播報却說「陳澄波也很焦急」，顯示大眾對二二八事件的陌生，引發許多台灣社會關注。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50709/36654602/>

不同，這一代高中生他們是台灣民主化之後出世的，他們接受的是自由、民主的社會，國家不義的事情他們會踴躍²³。他們現在踴躍，但是政府當局就是死不認錯、硬要凹，教育部長說「微調課綱有一百多項錯誤，但還是要做」。史學界可以做的大概都做了，問題是這個統治者是不是尊重民主體制。最近的民調顯示，支持反課綱的超過 58%²⁴，這個社會超過一半的人認為微調課綱是有問題，但他也不打算要踩煞車。這是逼迫年輕人用決裂的方式跟你進行反抗嗎？甚至要付出代價嗎？用流血的方式進行反抗嗎？我們的社會要這樣走回頭路嗎？到目前為止，針對課綱問題、歷史問題，公民團體和知識界其實很努力發聲、能做的都做了，真正的問題是我們政治人物，還有我們的在野黨（民進黨）也不用心、不努力。所以，如果民進黨重新上台，我也不認為他們真正會在台灣歷史這個部分更加用心。

2014 年三一八立法院佔領行動時很感動，很多老先生都進去議場了。我覺得台灣的歷史就是這樣，差不多就是一代、一代都在為一個比較理想生活方式的台灣，不斷在打拼。一代、一代都連續不斷，雖然有很多政治力在控制，讓你遺忘，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發生過甚麼事情。但總是有一些人不斷在努力、不斷在揭開歷史迷霧，做一代、一代的傳承。去年的三一八都有這樣

23 流行用語，「出來講」的台語音譯。

24 〈綠民調：近六成民眾支持反課綱微調活動〉，聯合報，網路新聞。<http://udn.com/news/story/1/1043750-%E7%B6%A0%E6%B0%91%E8%AA%BF%E8%BF%91%E5%85%AD%E6%88%90%E6%B0%91%E7%9C%BE%E6%94%AF%E6%8C%81%E5%8F%8D%E8%AA%B2%E7%B6%B1%E5%B%AE%E8%AA%BF%E6%B4%BB%E5%8B%95>

的現象，你看包括像蔡焜霖老先生，很早期 50 年代、60 年代的受害者，譬如說 70 年代的美麗島受害者，像施明德他們也站出來。我是覺得我們的社會也會改變，真正的改變的力量在社會、在公民，不是在政治人物，我們的社會如何給政治人物施加壓力，讓他們來回應，我想要做的方向是這樣。像是用選票施壓，讓他上台以後要必需做些事，兌現政見。所以，我們的公民好忙，要繼續忙，繼續監督，即使是現在的在野黨重新上台，也要繼續作一個有活力的公民。



陳翠蓮教授（右二）與工作坊同學合影

